



解读文本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风 蒋朗朗 王娟 编



博雅文学论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文学论丛

解读文本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风 蒋朗朗 王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文本: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王风,蒋朗朗,王娟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3274-3

I. ①解… II. ①王…②蒋…③王…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③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326号



书 名: 解读文本——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著作责任者: 王 风 蒋朗朗 王 娟 编

责任编辑: 延城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274-3/1·26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8.5印张 296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陈平原

2009年4月23—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盛况空前”,共提交学术论文103篇,加上未提交论文但主持各专题讨论会的三位教授,以及致开幕词的校长,险些凑成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正是因诸多前辈后学、旧雨新知的共襄盛举,加上媒体朋友的闻风而动,这次会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为了此次国际会议,我前前后后写了好几篇文章。作为“预热”的《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其中有这么一段自白:“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光辉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提及: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类似的意思,我在好多地方提及——而且至今坚

信不疑。此前一年,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我给国内外同行发去“邀请信”,除了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更称:此前八十年,“纪念五四”,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但也不无“走过场”的时候。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很多批评,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回应。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此次国际会议的分主题包括:五四新文学及新文化内部的多元场景;五四新文化与晚清新学的历史纠葛;新文学与新学术;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新时期文学与五四之关联;台港及海外作家如何与五四对话;重读五四与保守主义思潮等。之所以将论述的焦点锁定在“新文学”及“新文化”,除了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就在此,而现代作家及当代作家更是在与五四的对话中逐渐成长,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自我限制,以便获得学校的鼎力支持。外面的人只晓得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有责任扛这个旗子;不知道北大为了这个“责无旁贷”所必须承担的风险。此前十年,北大曾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会上若干发言“不合时宜”,被人四处告状,害得主办者做了好多次深刻检讨。因此,我这次申请办会,必须从技术层面上取消校方的顾虑。既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又必须适当控制会议的节奏与气氛;而且,这一切都不能明言,要处理得“水过无痕”,还真不容易。直到会议结束,代表们平安归去,各方反应良好,我这才大大松了口气——平日开会没那么复杂,谁让我们抢在这让人浮想联翩的节骨眼上,而且是在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

这些后台的“花絮”,不该影响世人对于“演出”的评价。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成功与否,关键还在各位学者提供的论文以及现场对话。这方面,我有自信——当初感觉不错,两年后翻看论文集目录,依旧兴致盎然。这三册、六大专题 62 篇文章,我相信还是能代表目前中外学界此领域的思路及水平。

会前,北大出版社刊行了中文系同人的论文集《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阅读五四新文化》;会议中间,中文系学生在办公楼礼堂演出了让代表们惊艳的“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会后,除了各种媒体上的报道,学生们撰写了四篇各具特色的研讨会综述——袁一丹《作为方法的“五四”》(《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张广海《“五四”遗产的溯源、建构和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林峥《触摸历史与对话五四》(《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7期)、王鸿莉《对

话五四》(《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8期)。

将所有会议资料装订成册,上交给学校,表示不辱使命,作为这次国际会议的主持人,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至于编辑会议论文集,就交给了王风、蒋朗朗、王娟负责。积极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除了以上三位老师,还有陈跃红、李杨、高远东、吴晓东四位教授,以及中文系办公室主任杨强,研究生张广海、袁一丹、周昀、林崢等,对于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深表谢意。

2011年9月1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 录

序·····	1
--------	---

文本阐释

白话散文与传统的再发明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五四的激进诠释学····· 张旭东/3

五四文学与乡土叙事····· 陈继会/33

许地山的“五四精神”与“台湾渊源”

——以《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为例····· 赖芳伶/43

从北大到台大

——台湾大学的新文学传承与转化····· 梅家玲/63

小说教育与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 鲍国华/82

写作时间与文学史现场····· 许子东/89

“人”脉绝续

——195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五四资源····· 姚 丹/102

五四文学的启蒙指归与当代的“底层”写作····· 赵学勇/115

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症候分析····· 李俊国/129

专题研究

· 女性研究

女性视界中的晚清诗学

——薛绍徽及晚清闽派女诗人对闽诗派的历史建构····· 钱南秀/145

从发刊词与征文广告看小说女作者的存在位置

——以清末民初小说杂志为观察中心 黄锦珠/166

五四离婚思潮与欧阳予倩《回家以后》“本事”考论 杨联芬/180

· 戏剧电影

五四运动与现代戏剧理论的诞生 费南山(Natascha Gentz)/189

家破国碎思家国

——四十年代的上海话剧与五四精神 邵迎建/200

巴金《家》与香港电影

——五四现代主义的重现 山口守/226

· 通俗文学

1921—1923年：中国雅俗文坛的“分道扬镳”与“各得其所”

..... 范伯群/241

另类五四青年与章回体罗曼史

——张恨水的北京叙事 宋伟杰/261

五四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究竟是什么关系 汤哲声/274

大众文化对“民间遗产”的继承与改造 徐国源/284

文本阐释

白话散文与传统的再发明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五四的激进诠释学^①

张旭东

如果说五四启蒙运动初始阶段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激烈地呼唤“人的解放”、“个体的自我决断”这些“现代”观念,那么在接下来的那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要处理的统称为“1930年代”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规模庞大的、体系化的努力:即将现代性的种子(作为从西方盗取的“火种”)栽种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的土壤里。对于那些深深赞同“世界主义”图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即进化论,强化了这一图景——的那些五四知识分子们来说,着手处理传统绝非意味着重新召唤一个神话的年代,从而接纳一个由象征仪式和集体无意识构成的非历史的空间。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中,他们重新发现了传统,在构造“现在的”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再次发明了传统。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里同对手面对面地交战使五四知识分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建立“中国新文化”体制并将其合法化,他们必须使传统也参与进来,也就是说,在这场极其政治化的斗争中要解构和重新激发一个“过去”。换句话说,在1930年代的经济、社会合理化和文化制度化的进程中,“新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中国的”,这一问题和“中国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和现代世界的生活相关的”同样重要。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这一处境、介入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超越了更为显著的政治路线的分野,在文化生产的领域,对于不同阵地、立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① 本文为作者199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ization: Zhou Zuore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Essay”(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之第六章,英文标题为“The Essa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or, Toward A Radical Hermeneutic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我们在这里必须精确地区分“历史”和“传统”，或者说，必须注意到这两者极富生产性的彼此交织的方式。在新文化的干将们看来，旧中国的“历史”是由统治阶级的历史、意识形态道统和文化霸权掌握着的。借助“过去”之光来理解“现在”，从策略上说，就是揭示出一个怪诞的连续统一体，它操纵着这一转瞬即逝的现代阶段。为此，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放弃全部文化传统。1930年代最具创新精神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没有把“现在”浸染在整体性的“过去”中，或者以“现在”之棱镜来评价过去，而是以各自的方式对传统进行着无声的但有条理的区分和识别。这一项工作，在每个意义上都重新激发了历史的活力，把历史重构成了一个持续冲突和矛盾的进程，因而，使历史成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或者说现代性的一个内在剧场。因此，激进的五四知识分子们持有一个决定性的政治立场，他们尽力地把传统历史化，从而使它成为“新文化”建设中一个有用的角色。同样的，这项工作也变成了一个明白无误的招牌，保守主义借此坚持着对传统的形形色色公式化的、非历史的、本质化的理解。

继历史和传统的区分而来的，是传统和正统的区分。事实上，一旦一个“非历史化”的传统成为一个无意义的范畴，那么对历史文本的诠释内部所出现的政治的或文化—政治的冲突就预示了权力状态。自从五四运动进入低潮之后，像鲁迅、胡适、周作人这样一些新文化阵营中的作家与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中国的启蒙运动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而且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从他们试图变革的文化传统中获取道德资源和文化资本的必要性——借助这些道德资源和文化资本，新文化阵营可以保卫自己，也可以召集人们起来对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中国正统堡垒进行反攻。从一场反对“传统”的全面战争转移到对“传统”（应该挽救的、重建的）与“正统”（必须拆解的、摧毁的）之间做出关键性的区分，周作人在1930年代的声望和这一新的文化转向密不可分。正如耿云志观察到的，五四知识分子们热衷于在中国历史中挖掘各式各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端分子，并且颇为自豪地宣扬这些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与文学创作，欣然将其视为自己的同道。在耿的观察中，这些异端资源包括：“1）先秦的非儒家派别；2）上起《诗经》，下迄明清白话小说的一切民谣、民歌和白话式的作品；3）魏晋时代的反叛文人的写作、思想和举止；4）从王充到康有为、章炳麟这一怀疑的、不迷信权威的传统；5）从墨子、经由王充、再到清中叶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一中国实用主义传统；6）从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到‘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等人的政治和思想活动。”^①

周作人与这些文学、思想和政治倾向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是由他的教育背景、阶级意识和他早年在白话文革命中形成的思想状况共同决定的。即便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有意识地重建非正统的传统就已经是他最关心的议题了。他提倡研究中国的民间歌谣，并且在诗学上努力尝试将现代思想的灵感和一个在中国散文传统中滋生的平衡的美学风格结合在一起，这一努力在当时就被高度评价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成就”之一。在文化上重新发掘一个非正统的“传统”，既为新文化开掘了资源，也成为了一个历史命题——将现代性视为“过去”的一道地平线。如果我们根据这一诠释学操作来看待周作人1927年的转变，将会发现这一转变不过是他自己的思想和风格规划的逻辑发展添加了一个感伤的注脚，而这一规划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触及了新文化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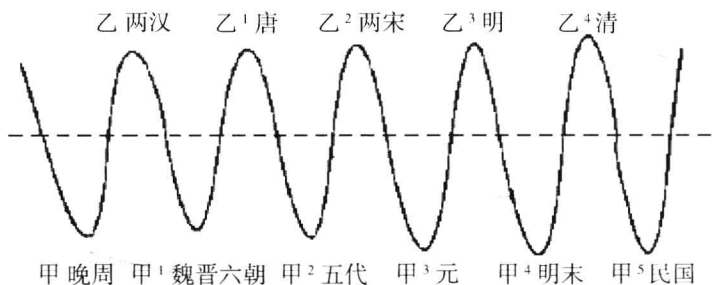
一、历史—文化差异与现代性的内化

1932年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做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经由他的学生邓恭三（邓广铭）记录和汇编，最后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这本书1932年在上海出版以后，立刻成为了一部经典作品。不仅因为这本书表明了周作人对文学的大体看法，尤其是对新文学的看法，而且通过对张力重重的中国文学史进行系统的重新解读，周作人阐发了他的散文理论。事实上，正如我将在下文中表明的，这一作品的重要性和它在理论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史的范围。毋宁说，它是在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工程发言，亦即针对传统来定义白话文革命，针对日常生活和前美学状况来建构新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话语和文体的实践）的经典，最后在一个文化—政治自我决定的过程中，将新文化重新建基于一个再发明的传统之上。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试图提供一个新文学的系谱，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传统及其流变。在这一新的系谱中，“现在”不仅在传统中找到了它的根基，并且将一个业已存在的生活世界——作为一个被压制的过去一直与“主流”相互缠绕——收归名下，以使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传统和变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周作人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区分为两个系统，并且把这一历

^① 耿云志：《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27—132页。

史重建为这两个系统在时间维度上互相竞争、互相更替的过程。正如他说的：“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从而，他给出了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图示。图示中，虚线表示中国文学在时间发展上的方向，周作人指出，这样一个直线的发展线条是纯粹空想的，实际并不存在。这条线的下方，是表现主义的传统，或者说是“诗言志”旗帜下的文学；而在这条线的上方则是教条主义的传统，或者说是“文以载道”的教条统治下的文学作品。



这样解释文学史，周作人的本意当然不是要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理论或新范式，毋宁说，他的这一解释完全是他文化批评运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种叙述中，中国文学史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想象中的连续体，它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倾向或力量的持续斗争之上。这一投射的能指，与其说具体体现了这两种倾向或力量的共同的、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不如说它是作为区分两个具有各自历史的疆域的一种边界而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作为这两种历史互相竞争和互相作用的场所而存在的，在这个空间中，各种文体样式、文学范式和文化霸权以支配、反抗和寻找替代品的方式发展进化。乍看之下，周作人描绘的中国文学史，就像一条蜿蜒穿越文化地貌的“自由自在的河流”，这如果不是出于纯粹的偶然而形成的一个超历史图式，就只能是一个非历史的圆圈（“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然而当我们进一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周作人的图示旨在从一系列儒学正统文学经典所统领的文学史编纂中挖掘一个具有内在差异性的历史。表面上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戏剧化，实质上周作人指出了中国文学过去的经验内部的一种激进的异质性。这一内在的多样性或异质性不仅仅解构了“中国文学的伟大遗产”这一压迫性的同一性表述，而且通过一个关键的

区分,进一步使这一复杂的经验呈现在一个现代的视角中,这一视角从西方以及从曾被它排斥的“传统”中寻求它的同盟。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对他的“理论”做了值得关注的详细阐发。对于周作人来说,文学的兴衰和社会—政治的处境密切相关:文学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背反。在晚周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正是大纷乱的时候,国家不统一,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社会上更无道德标准之可言”。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第一次文学和思想的创造性爆发,一次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文化大繁荣,这是因为社会—政治的多样性和解体状态使得“文学上也没有统制的力量去拘束它”,因此,“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讲的话,各派思想都能自由发展”。周作人把这一时期定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先的一次诗言志的潮流’^①。

与这一状况相反,在西汉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比较顺畅,政治系统也相应地比较公正。然而自从董仲舒以来,“思想定于一尊,儒家的思想统治了整个的思想界”,其后“文学也走入了载道的路子”。在周作人看来,除了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作品以外,这个时代很少有文学作品可以和晚周及随后魏晋时代那些富于原创性的、充满生机的、在形式上独具禀赋的作品相媲美。^②

既然中国的社会始终在乱与治、衰退与复兴中摇摆,中国文学也就经历了个人创造力的繁荣时期,以及在单调僵化的官方儒教意识形态影响下的集体平庸时期。周作人态度鲜明地认同他喜欢的作家作品,并批评那些他认为“无聊”的作品。比如说,他赞赏像六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和《严氏家训》这些相对生僻的非主流作品,不仅欣赏这些作品对日常经验平易自然的讲述,而且欣赏他们思想上的坦诚和豁达,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讲,“即使他生在现代,也绝不算是落伍的人物”^③。相反,他对在中国文学史中几乎占据无可争辩的经典地位的唐代文学却评价很低。在他看来,唐朝诗歌的繁荣只不过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因为当时的诗歌写作不仅在考试中是必需的,而且还是选拔官员最重要的标准。于是,“作品多了自然就有很多的好诗”,周作人争辩说这个情形与主要作为一种私人表达的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北平人文书店1934版,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六朝时候的创作情形是不相同的”。^①周作人进一步指出了堪称唐代最伟大的散文家、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作为一种坏文学的“随手的举例”——这种文学以宣扬儒家道统的说教目的为己任。

周作人明确地将“言志”传统和“载道”传统对立起来，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更关心的是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从而向他的追随者们指出正确的文学道路。周作人版的摇摆在两极之间的中国文学，看起来似乎与历史和美学的循环论有所接壤。这种笼统而言对于历史，具体而言对于文学史的、似乎是愤世嫉俗的观点——即把历史看作循环的、非历史化的一幕戏——招来了一些轻率而简单的质疑。的确，他宣称，他更关心对文学的一般观点或“态度”的观点可能更强化了这样一种理解，即他是以牺牲文学史为代价以表明一个理论观点，他的中国文学史是一条“自由自在的河流”的理论并不能处理被不同的文学创作思想所分割开的各个时代之间的复杂关联。然而一旦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观察，就会认识到，与其说周作人要在美学价值判断或政治姿态上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毋宁说，他是将中国文学史处理成“一个”不断变革和转向的整体过程，一个充满着不连续性的连续体。比如说，在周作人看来，元代新文学运动，以元杂剧的兴起为代表，显示了中国文学从既存的回路和旧伎俩中解放出来的内在倾向。类似的，16世纪上半期的前后七子，则是站在试图超越元代和明代早期文学范式的立场上，以一种复古的——即回到数千年以前去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遗产——策略演化发展的。而周作人对公安和竟陵两派作家的欣赏则不仅因为他们在风格上有所创新，更在于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变革和再发明，这个想法甚至比“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②。周作人强调公安—竟陵作家和新文学知识分子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坚持对文学进行变革，并且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前者生活的时代是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即西方文化尚未传到中国之时）。^③

真正要紧的不是要废弃传统，而是告诉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意味着什么，以及怎样通过激进的历史变革来改造和发扬这一传统。因此，周作人的观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

③ 周作人半开玩笑地假设，如果从现代胡适的思想中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响——科学、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等，那便是公安派思想和主张了。

点并不是要表明在传统中有好的和坏的部分,并且告诉我们应该把“言志”传统看成是好的、合法的传统遗产,从而站在它这一边去反对与之相反的“载道”传统(尽管这恰好是他在1930年代的特殊情境中所呼吁过的)。周作人所鼓励的是对传统的重新定义,这一工作基于具体历史时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些时刻中的每一个都呼唤着和预示了再现自身的方式。因此,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摇摆”模式,意味着在试图处理特殊的历史情境时强调抵抗、妥协和激进变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从这一角度看,传统并不是一个物化的结构,由那些试图保存它们自己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权力的僵化经典所构成,相反,它是“一条自由自在的河流”,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地形,它在不断地塑造自己,不断地重新寻找自己新的方向。因此,在周作人那里,与其说“言志”指个人内在情感的主观象征化,毋宁说它是一套再现机制,通过借助相对透明和自然的个人自我流露,确保了它与社会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和全面参与。同样,周作人主张的(在某些时候自我确信的)反说教的说教主义则体现了去寻找和再现真理——并非任何道德、正统意义上的真理,而是现代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现实——的强烈意图。

周作人完全赞同袁宏道针对当时文人照搬前代经典的习气的抨击。他全文照录地引用了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的评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公安派在周作人的中国文学史中是“言志”文学的典范之作,而《序小修诗》一文则是定义公安派文学主张的重要文献,因而在下面所引的袁宏道的论述中所透露出来的“变”的哲学,对我们领会周作人“依时代再发明和再定义传统”这一观点非常重要。袁宏道这样写道: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准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准魏晋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①

周作人认为这些话“说得都很得要领,也很像近代人所讲的话”^②。除了赞赏袁宏道对崇古习气的批评和他对变革的提倡外,周作人还颇欣赏他

① 袁宏道:《叙小修诗》,引自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44页。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45页。